

殷墟甲骨发现的历史和意义

胡辉平

今日谈及甲骨，世人皆知此物为国中之宝。甲骨存在世间的历史已久远，可是，其价值却是仅在近代才被世人慧眼辨识出来，其经济价值我们无从估量，但其史学价值却是有目共睹的。在甲骨文出土之前，中国号称“五千年的文明”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是自《史记》开始，实际不过三千年，而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的发掘，恢复了一大段古史，把中国有文字的信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从而使“五千年的文明”名副其实。

一、甲骨文发现之花絮

提起甲骨之发现，人们立刻会联想到王懿荣。据《清史稿·列传》等文献记载：王懿荣，字正孺，山东福山人。光绪六年进士，二十一年署国子监祭酒。二十六年（1900）充团练大臣，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投井自杀。后追赠侍郎，谥文敏。他博学书史，嗜好金石，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始向古董商购买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共收集了1000余片，是中国最早收集甲骨文的学者之一。

传统的流行说法是，王懿荣生病吃中药时发现了甲骨，从而追认其为最早发现甲骨的人，是“甲骨之父”。然而，李先登先生在《关于甲骨文最初发现情况之辨正》中对王懿荣是“甲骨之父”提出了质疑^[1]。李先生认为最早收集甲骨，并认出甲骨文的人不应是王懿荣，而是王襄。王襄，字伦阁，斋号篁室，天津人。1876年出生，解放后任天津市文史馆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去世。王襄从1899年起共收藏甲骨3000余片，现藏于天津历史博物馆，著有中国最早的一部甲骨文字典——《篁室殷契类纂》（1920年，天津博物院石印本），以及《篁室殷契征文》（1925年，天津博物院石印本）等，是我国最早一代的甲骨文专家。李先登先生在王襄的遗著——《篁室殷契·序》找到这样一段记载：“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一八九八年始，潍（山东，潍河）友范寿轩售古物，来言河南汤阴（实为安阳）出骨版（实为龟甲），中有文字，征询吾人欲得之否？……翌年十月，范君来，且告以得骨版，期吾齐到彼寓所观赏。”当时王襄、孟定生就认为此为三古遗物，并与范君议定价格，“骨之巨者，一字一金，小块以块计”。但王、孟当时均为寒仕，只能尽力收之。余下的甲骨，据（范君）说“尽售王廉生（王懿荣）得价三千金”。由此可知，在收藏同一批甲骨的过程中，王襄发现甲骨的时间早记载中的王懿荣一年。

关于甲骨文是何年、何人发现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1899年，由北京的王懿荣第一个认出甲骨上刻的文字为殷代的文字。第二，1898年由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最早辨认出甲骨文。第三，汐翁在《龟甲文》中认为，甲骨文是最先由王懿荣和刘鹗共同辨认出来的。总之，众说纷纭。然而，王懿荣、王襄等人都已作古，究竟谁为“甲骨之父”，相比于甲骨文发现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金石学发展到清代已很兴盛，财资颇富的有识之士，多好古物。甲骨文字有些与青铜铭文相似，或有明显的发展脉络，因而当甲骨刻辞出现，有人能认出其为甲骨文当不足为奇。在王懿荣、王襄和孟定生等之前，或许早就有人认出了甲骨上的刻辞应是商代文字。王懿荣、王襄和孟定生等同为甲骨收藏家，惟有王懿荣被认为是“甲骨之父”，只因王懿荣官位高，收藏甲骨的量大而闻名。

二、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的历史

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一样，甲骨的出土发现也经历了一个由盲目私挖到科学发掘的历史过程。最初，殷墟甲骨是由村民们私挖当作药店的龙骨出售的，而后才被有识之士辨认出来，从此甲骨的身价大增。起先，王懿荣等以“每版价银二两”收买，其后端方则按字数计价，“每字酬银二两五钱”。正是由于利益的驱使，私挖乱掘的泛滥使得文物宝库遭受了极大的劫难，一大批的珍贵甲骨流失到国外。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自由出入中国对中国文物又是一次洗劫，因而现今西方国家大多藏有中国不少的甲骨。今天英国、日本、加拿大、荷兰等均有不少甲骨文著录和研究方面的专家，使今天的

甲骨学成为又一门国际显学。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为了对殷墟地下埋藏的甲骨进一步全面了解，避免再度私挖乱掘，所长傅斯年派董作宾到安阳小屯村进行调查，并开始正式发掘工作。从此，闻名于世的“殷墟发掘”就拉开了帷幕。1929年，李济担任考古组主任，主持3月至5月的第二次殷墟发掘。至1937年6月，一共进行了15次发掘，总计出土甲骨24918片。八年抗日战争，殷墟再次遭受私挖乱掘，甲骨又一次严重流失国外。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殷墟文物的法令。1950年，并在小屯村设立了“殷墟遗址保管所”。1958年，中科院考古所建立了“安阳考古队”，后又建立工作站。20世纪30年代的“殷墟发掘”开了科学整理研究甲骨文的先河，而建国后两批重要的甲骨发现更使这一工作渐臻完善。1973年，小屯南地发现商代刻字甲骨，经缀合后实得甲骨4500余片。1991年，花园庄东地和南地又见刻字甲骨584片，其中完整的卜骨将近300片。这两批甲骨内容丰富，颇具特色，且又有明确可靠的地层关系，并常与有分期特征的陶器共存，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科学资料。

自十九世纪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发现甲骨，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出土甲骨约15万片（这其中不包括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土的：1990年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584片，2002年7月小屯村又有甲骨出土），经著录的甲骨将近10万片。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35600多片，差不多占总量的1/4，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馆藏之丰富令人屈指，资料之珍贵更令人咋舌。国图所藏35600多片甲骨，其中被《甲骨文合集》收录仅有8000多片，余下均为从未发表过的原始资料。

甲骨久埋地下几千年，极易损毁。除解放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外，由于种种原因，使原是完整大片的甲骨分散于各家，有幸归于一收藏的，往往由于经久搅乱，也不能缀合原状。从单个的碎片甲骨看，没什么价值。一旦缀合成大片，或许就能使争论已久的问题“拨开乌云见晴空”。王国维1917年按“文字体势大小及两片断痕符合（体势，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甲骨文的字体风格和刻字时所用力度大小）”，缀合了《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中的1.10号与《殷墟书契后编》中的8.14号两片甲骨，得出报乙在报丙、报丁之前，与《史记》报乙在报丙、报丁之后不同，从而更正了《殷本记》中商王系谱的世次顺序（图一）。[2]自此开了甲骨缀合之先河，使原先星乱的残存卜辞有望能完整的展现。此后，各家在整理研究甲骨文时，开始致力于缀合工作。甲骨缀合之益于甲骨学研究，不单是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其他改变旧说方面也屡见不鲜。如卜辞中的“它”、“它示”，以往误以为蚕神。张政烺先生在《释它示》一文中提出修正，以为“卜辞中没有蚕神”，但张先生误以为它示即二示，即旁示先王。[3]后又由裘锡圭先生缀合两版卜辞，它示与二示见于同一版，可知它示不等于二示（图二）。[4]诸如此类，因甲骨缀合而改变旧说的例子举不胜举。因此，将资料完善整理，完整的公之于众，供更多的人来利用研究，这是对学术界应作的贡献。

自19世纪末甲骨文被发现，至20世纪30年代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取得大量成果以后。经许多学者的长期研究，甲骨学这门新兴学科才得以建立。甲骨学从最初的考文释字开始，逐步深入到商代社会组织、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活动，包括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各种日常活动方面，使我们逐渐对商代社会的具体情况有所了解，并且纠正和澄清了许多传统的偏见和误解。

例如，商代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史学界的意见比较分歧。但有些具体的问题是比较清楚的。毫无疑问，商代已经出现奴隶制。但奴隶制是否已发展成为主要的社会形



图一

态，从甲骨卜辞上并未找到充分的证据。过去认为用作牺牲的人都是奴隶。然而卜辞中祭祀时杀为祭牲的人，均是战争中所俘获的羌人，而不是奴隶。卜辞中常见有战争中“获羌”，祭祀时“伐羌十人”，“三羌三牢大乙”的记载。这表明，以人为牲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数以万计的俘虏杀为祭牲，正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尚未达到将战俘保留下来变成奴隶以榨取劳动成果的程度。商代的奴隶大多是家内奴隶，主要从事非主要生产，如畋猎、参加战争等。这种情况突出体现在武丁、祖庚时期。然而，廪辛、康丁以后，屠杀战俘作为牺牲的现象急遽减少，这正反映了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必然导致俘虏被活留转变为奴隶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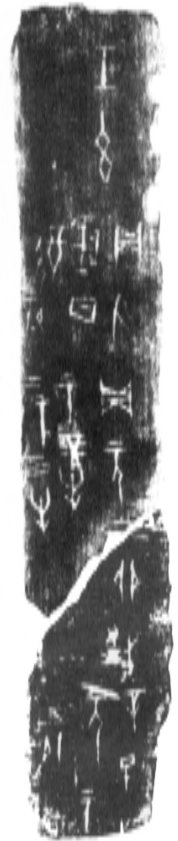
三、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的意义

王宇信先生曾在《甲骨学通论》中写道：“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其后的科学发掘，形成了甲骨学和殷墟考古学这两门全新的学问。从此，由于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生面了。甲骨学成为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等学科有密切关系的当今显学和世界性的学问。”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简单的讲，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的“金石学”已开始向现代学术转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传入，使传统的金石学向“古器物学”阶段发展，不仅使之离近代真正意义的“锄头考古学”的产生日益接近，也为甲骨文的鉴定、收集和研究准备的条件。从此有了以王懿荣为代表的收藏家，罗振玉、王国维等考释甲骨之业。

其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殷墟考古学的发掘提供了契机。当年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主要目的是甲骨，但与大量科学发掘甲骨出土的同时伴随出土了大量遗迹和遗物，又为我国殷墟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8年10月—1929年10月的第1—3次殷墟发掘正是我国殷墟考古学的“萌芽阶段”，第4—9次殷墟发掘，我国殷墟考古学刚好经历“形成阶段”，第10—15次殷墟发掘阶段，中国考古学才走进“成熟时期”。同时，考古学研究方法引入甲骨学领域，又使甲骨分期断代研究有了重大突破，甲骨学也从而由金石学的附庸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其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旗帜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疑古辨伪学者”，继承了清末“新史学”反封建精神，逐渐形成了以《古史辨》为阵地的“疑古学派”。这颗投向史学界的原子弹，使“古史系统”彻底倾覆。学术界倍感当时考古资料匮乏，与考古学向地下发掘新材料的同时，罗振玉、王国维以甲骨文的搜求和阐发为基础，走上了“证古”、“释古”的道路。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与文献记载对照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为史学研究开辟了又一蹊径。他们在新史学的建设中，取得大量的科学成果，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二

注释：

[1] 李先登：《关于甲骨文最初发现情况之辨正》，《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

[2]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上海学术丛编》，1917年；又入《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

[3] 张政烺：《释它示一论卜辞中没有蚕神》，《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见第630页。

[4] 裘锡圭：《甲骨缀合拾遗》，《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92年，又入《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见第230页。